

# 關於世界近代史 開端的若干問題

——馬列著作學習札記

編者按：世界近代史的開端究竟定於何時，才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我們應該作出自己的獨立的研究。本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本刊發表陳佳榮同志的有關文章，以期引起注意和討論。

多年來，我們史學界一直把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這種分期法雖不無道理，但問題很多。通過學習馬列著作，自己頗受啟發，獲益匪淺，覺得劃分中古和近代的界標不該是1640年，而應往前推一百四十年，定在十五、十六世紀之交，即1500年。現不揣淺陋，談點學習心得，權作引玉之磚，就教於史學界和廣大讀者。

## (一)

乍看起來，歷史分期問題似非要事。因為人類歷史雖則時進時退、曲折迂迴，但總是後浪推前浪地奔騰向前。與之相較，古代、近代、現代等時間概念都是相對的、變動不居的。再過若干萬年，我們現在所謂的“近代”也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短暫的一瞬，不免要被後人歸入“遠古”之列。可是，我們既然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期的社會主義中國，那就義不容辭地應該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逝去的歲月作出盡可能符合實際的科學說明，以便掌握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自覺地投入改造社會、變革自然的偉大門爭之中。

全部人類世界歷史通常被劃為“古代”(又稱上古)、“中世紀”(又稱中古)、“近代”和“現代”幾個大的時期。“古代”、“中世紀”、“近代”的概念是十五至十六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歷史學家最早使用的。我們承襲了這些名詞，並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賦以科學的內涵。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不外是各個時代社會經濟結構有規律的更替。馬克思、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研究了全部歷史，第一次提出人類社會有五種基本的經濟形態：原始公社制、奴隸佔有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包括它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從此，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就成為科學地劃分世界歷史各大時代的一個基本標準。正像馬克思指出的：“總之，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生產關係，是隨着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係總合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係，構成為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為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和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誌着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僱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3頁)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標準，我們史學界一般把世界上古史作為人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時代的歷史；中古史相當於封建時代；近代史成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走向衰亡的歷史；現代史則肇端於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標誌人類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

世界近代史既然相當於資本主義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走向衰亡的歷史，它的開端自然應該從資本主義時代來臨之際算起，我們所擇的分界路標也必須與之大體相應。可是在這個問題上，現行的分期法卻與上述公認的標準相互牴牾。

在歷史上，資本主義這一生產方式究竟產生在何時？顯然不是十七世紀中葉的1640年。對此，馬克思有一系列極為明確的論述：“不能否認，資產階級社會已經第二次經歷了它的十六世紀，我希望

這個十六世紀把它送進墳墓，正像第一個十六世紀給它帶來了生命一樣”（〈致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頁），“雖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十六世紀才開始的。”（《資本論》第一卷，同上第23卷第784頁）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馬克思也把十六、十七世紀並稱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童年時期”（同上第13卷第148頁）。

馬克思、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人，又生活、戰鬥在資本主義發源地的歐洲。他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深入觀察、研究了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和分析了汗牛充棟的材料。他們的光輝著作當是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指導思想。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隨着”（《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2頁），而他們提出資本主義時代始於十六世紀，正是對中古和近代之交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進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科學結論。

早在十四、十五世紀，意大利的某些城市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工場手工業開始出現，最初幾次的僱傭工人起義也發生了。在農村，農奴制關係瓦解得很早，有些地區的農民甚至遠自十三世紀下半期起就開始擺脫農奴依附地位。西歐其他一些國家如尼德蘭等，在同一時期也相繼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誠然，就整個歐洲甚至就意大利等國本身而言，這些都只是封建關係汪洋大海中最初的幾個資本主義小島。把資本主義的萌芽作為中古史終結的標誌是不合適的。可是在十六世紀，資本主義就不光是萌芽的問題了。

到了十六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業已產生。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提出了這個總的結論，而且從生產方式、交換方式乃至整個上層建築各方面（意識形態、政治鬥爭等），具體而又明確地分析了這個問題。這就像列寧所說的，“馬克思關心的是一件事：用準確的

科學研究來證明一定社會關係制度的必然性，同時盡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列寧選集》第1卷第32—33頁）。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工場手工業時期在十六世紀就開始了。他在《資本論》中指出：“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這種協作，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佔居統治地位。這個時期大約從十六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葉”，“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相當強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3、808頁），“如果在十六世紀，部分地說直到十七世紀，商業的突然擴大和新世界市場的形成，對舊生產方式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產生過非常重大的影響，那末，相反地，這種情況是在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生的”（同上第25卷第372頁）。在十六世紀，各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雖然不盡相同，但幾乎西歐所有國家都在某種程度上，以某種形式捲入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過程。其中，尼德蘭的資本主義關係得到了比較廣泛的發展，並逐漸成為真正工場手工業的典型。

從十六世紀起起的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西歐許多國家無論城鄉在生產關係方面都出現劇烈而深刻的變革，殘酷剝奪本國勞動者和掠奪殖民地人民的資本原始積累加速進行着。對農民土地的剝奪是原始積累全部過程的基礎。在這方面，英國具有典型的形式。“在英國，農奴制實際上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了。當時，尤其是十五世紀，絕大多數人口是自由的自耕農，儘管他們的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的招牌後面。”（《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785頁）“從亨利七世（1457至1509——引者註）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這樣無情地處置過傳統的農業關係，都沒有創造出如此適合自己的條件，並使這些條件如此服從自己支配”（《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同上第26卷II第263頁）。可見，就是英國本身，資本主義的產生也不會遲至十七世紀中葉。馬克思明確指出，在英

國，“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奠定基礎的變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紀最初幾十年演出的。”（《資本論》第一卷，同上第23卷第786頁）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到處侵略和掠奪。自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後，歐洲資本家在剝奪本國勞動者的同時，也加緊向亞、非、拉丁美洲各國進行殖民擴張，對當地人民實行血腥的奴役和敲骨吸髓的剝削。“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着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揭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167頁）。這也說明，亞、非、拉丁美洲廣大地區從十六世紀後就開始捲入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

隨着資本主義的產生，代表這個新的生產方式的階級——資產階級也成長起來了。它要求發展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改革舊的封建生產關係及其上層建築，渴望取得政治統治權，並產生了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十四、十五世紀在意大利最先出現的文藝復興，正是資產階級為自己登上政治舞台而敲響的陣陣緊鑼密鼓。恩格斯對文藝復興先驅人物但丁曾作過這樣的評價：“意大利是第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共產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9頁）如果說，意大利早期文藝復興還只是孕育在封建社會母腹中的嬰兒的躁動，那末到了十六世紀，後期文藝復興已成了呱呱墜地的資本主義的第一聲喊叫。這時文藝復興進入了鼎盛時期，擴展到尼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文學藝術空前繁榮，近代自然科學突飛猛進。很明顯，後來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輿論代表人物不單從十七世紀英國革命，而首

先是從文藝復興吸取了養料。

也正是在十六世紀，西歐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不僅已不限於進行輿論準備，而且也已經不滿足於像過去那樣依靠王權去反對封建貴族的割據勢力，他們更進而展開了奪取政權的最初戰鬥。十六世紀初期開始的宗教改革、德國農民戰爭（1524—1525年）及尼德蘭革命（1566—1609年），都是在宗教外衣蔭蔽下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鬥爭。它們比英國革命早一個世紀就宣告了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來臨。這些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及意義是不容懷疑的。恩格斯多次把宗教改革譽為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並將它和1640年英國革命、1789年法國革命並列在一起：“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長期（在德譯文中不是‘長期’，而是‘偉大’。——編者註）鬥爭，在三次大決戰中，達到了頂點。第一次是德國的所謂宗教改革。……”（《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90—391頁），“四百年前，德國是歐洲中等階級第一次起義的出發點”（同上第403頁，另參見第57頁），“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並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國的統治，並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2頁）。在一些私人通信裏，恩格斯也反覆提到“十六世紀德國資產階級革命”（致弗·梅林，同上第503頁），德國“成為以宗教形式（所謂宗教改革）出現的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致卡·考茨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67頁）。列寧在《談談對俄國革命的估計》等文章中，同樣經常把十六世紀德國資產階級革命與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相提並論（參見《列寧全集》第15卷第40頁、351頁）。

總之，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綜觀西歐一些國家的情況，不論就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變革，抑或從上層建築領域

的鬥爭來說，都不難看出資本主義時代在十六世紀業已肇始。既然世界近代史在社會發展階段上相當於資本主義時代，那就應該把十六世紀作為它的開端。

## (二)

也許有人認為，中古史既為封建社會的歷史，而在十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尚未滅亡，把近代史的開端定在1500年未免過早。其實在英國革命之後，歐洲封建制度又何嘗完全滅亡。當時除了荷蘭、英國等國外，其他仍然是封建國家，又過了一百年法國才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而別的歐洲國家則晚至十九世紀中葉資產階級革命才相繼發生。關於這種歷史現象，列寧曾經說過：“當然，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過去和將來的成分交織在一起，前後兩條道路互相交錯。僱傭勞動及其反對私有制的鬥爭在專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農奴制時代就已經萌芽了。但是這絲毫不妨礙我們從邏輯上和歷史上把發展過程的幾大階段分開。我們大家都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東西，我們大家都無條件地堅決主張必須把這兩種革命極嚴格地區分開，但是，難道可以否認前後兩種革命的個別枝節成分在歷史上互相交錯的事實嗎？難道在歐洲民主革命的時代沒有許多社會主義運動和爭取社會主義的嘗試嗎？難道歐洲不是還有許許多多民主主義性質的事情要由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去最終完成嗎？”（《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1卷第576頁）

這裏牽涉到劃分歷史時代的另一個重要標準。我們知道，歷史唯物主義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變的。同時，馬克思主義也十分重視上層建築，特別是重視階級和階級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唯物主義者……不僅指出過程的必然性，並且闡明正是甚麼樣的社會經濟形態提供這一過程的內容，正是甚麼樣的階級決定這種必然性”（《列寧全集》第1卷第379頁）。因此，劃分歷史時代必須堅持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統一，既要首先考慮社

會經濟形態，也要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這二者盡可能完善地結合起來。

關於劃分時代如何堅持階級分析方法的問題，列寧有一段言簡意賅的說明：“這裏談的是歷史上的大時代，無論過去或將來，每個時代都有個別的、局部的、時而前進時而後退的運動，都有脫離一般運動和運動的一般速度的各種傾向。我們無法知道，這個時代的某些歷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麼快，有多麼順利。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着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打着別人的旗幟），《列寧全集》第21卷第123頁）資本主義向它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的過渡，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完成的。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儘管帝國主義依然在世界各地張牙舞爪地猖狂一時，但它畢竟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泥足巨人，是紙老虎。而無產階級卻是當今時代的中心，決定着時代的主要內容和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因此我們可以也應該宣稱人類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

“在十五世紀時，封建制度在整個國西歐都處於十分衰敗的狀態”（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0頁）。值此兩種時代交替之際，社會上呈出色色繽紛、眼花繚亂的歷史場面。許多地方農奴制關係和自然經濟日趨瓦解，手工工場迅速發展起來，剝奪勞動者的原始積累正在加劇進行，地理大發現引起了商業革命和價格革命，小說、詩歌、戲劇、繪畫、雕刻等方面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自然科學向教會權威進行了勇敢的挑戰，有自己的法律和武裝的市民城市不斷湧現，以民族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國家紛紛建立，打着宗教旗幟的反封建鬥爭一幕幕地展開。儘管德國農民戰爭的領袖閔采爾及其戰友被斬首示眾，堅持科學真理的布魯諾被送上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場……，但是只要透過這些紛繁的現象，深究其背後的經濟動因和階級鬥爭，把握住時代的脈搏，人們就

不難看出：資本主義已經誕生，正在代替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也只有瞭解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這種客觀趨勢和階級內容，我們才能弄清“在這個具體環境裏，哪一個階級的運動是可能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列寧：〈打着別人的旗幟〉，《列寧全集》第21卷第121頁），才能像列寧要求的那樣“從邏輯上和歷史上把發展過程的幾大階段分開”，並對紛繁紊亂的歷史事實作出科學的解釋。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僅提出了歷史分期的準繩，而且他們自己也根據這種科學標準來分析歷史的時代，為我們樹立了範例。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資本主義時代誕生於十六世紀，已如上述。其實他們對於近代史發端的具體時間也有具體的論述。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恩格斯寫道，“現代自然科學，和整個近代史一樣，是從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算起，這個時代，我們德國人由於當時我們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稱之為宗教改革，法國人稱之為文藝復興，而意大利人則稱之為五百年代（即十六世紀。——編者註），但這些名稱沒有一個能把這個時代充分地表達出來。這是從十五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時代。……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4-445頁）。該導言的初稿〈歷史的東西〉這一札記裏也有類似提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3頁）。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中，也曾把十六世紀初期德國宗教改革的領袖路德明確列入“近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93頁）。

列寧對世界近代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分期有過不少具體指示。在〈打着別人的旗幟〉一文中，列寧提出：“通常把歷史時代劃分為三個時期：(1) 1789-1871年；(2) 1871-1914年；(3) 1914-? ……當然，這裏的界限跟自然界和社會上所有的界限一樣，是有條件的、活動的、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我們只是大致地挑出那些特別突出、引人注目的歷史事件作為大的歷史運動的路標。”（《列寧全集》第21卷第124頁）列寧對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非常重視的，曾作

過很高的評價：“法國大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選集》第2卷第668頁），“……整個十九世紀，即給予全人類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革命的標誌下度過的”（《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同上第3卷第851頁）。在《論民族自決》、《第二國際的破產》等一系列著作中，列寧都再三明確提及1789—1871年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對法國革命雖然極為重視，但他當然不會認為資本主義時代應自1789年算起，也沒有直接提出1789年就是世界近代史的開端。恰恰相反，在《關於帝國主義的筆記》中，列寧的某些評註卻對我們很有啟發。在摘錄艾德蒙·烏布利希《世界強國和民族國家》一書時，列寧寫了這樣的批語：

我的補充：“（時期）時代

Ergo（即。——譯者註），1500—1789=289年

1789—1871= 82年

1871—1914= 43年

（《列寧全集》第39卷第687頁）。緊接此書的摘錄，列寧以“近代史的‘時期’”為標題寫道：“關於近代史的歷史時期問題，再參看保·赫雷的《世界史的史料學》（萊比錫，1910），這部著作附有參考書目，並對時期作了一般的劃分，順便舉出這樣一些‘時期’：‘中世紀的世界霸權思想時期’（約800-1250）。——‘民族國家產生時期’（約1250-1500）……‘民族立憲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時期’（約1789-1870）……‘世界國家和世界經濟時期’（‘約1870-1910’）。”對這段話列寧還特別加上旁批：“注意：近代史的歷史‘時期’”（同上第691頁）。

從這些批註來看，在關於資本主義時代的肇始、近代史的開端等問題上，列寧的看法和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基於對社會經濟形態的論述，基於甚麼階級是時代中心的判斷，他們

在具體分析近代史開端時，都特別重視十五至十六世紀之交這一時間。

### (三)

如上所述，根據十五、十六世紀之交歷史的發展進程，以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科學分析當時客觀情況而得出的結論，把中古、近代的分界路標推得過遲是不恰當的。因此，1640年的分期法存在不少弊病。首先，它同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分期的標準不盡相符，把資本主義的產生時期，即第一階段——工場手工業時期整個割裂成兩半，分置於中古、近代兩個時期的史籍之中，忽略了資本主義在十六世紀後近一個半世紀的重大成就。同時，這種分期法把宗教改革等第一次重大的資產階級革命排除於近代史之外，使密相關聯的幾次早期資產階級革命被人為地分隔，破壞了歷史的連貫性。我們研究的是世界範圍的近代史，可是世界上第一次勝利的資產階級革命——尼德蘭革命卻屬於封建時代的歷史，被馬克思稱為“十七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一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的”荷蘭（《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0、822頁），也長久被安放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階段之內。

這種分期法不僅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實際，且給歷史研究和教學工作帶來了許多麻煩和極大的不便。例如我們編寫整個亞、非、拉丁美洲近代史，一般自然該從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後西歐殖民主義入侵和各國人民反對殖民侵略的鬥爭寫起，研究荷蘭近代史也不能晚於1566年尼德蘭革命，可是整個世界的近代史卻比某些地區或個別國家遲到幾十年乃至一百多年！在一些教科書裏，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資本原始積累、地理大發現、血腥的奴隸販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德國農民戰爭、尼德蘭革命等重大歷史事實和事件，或則被分割得支離破碎，或則被當成中古史的尾聲、近代史的序幕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講起近代史課，一上來就是圈地運動，這使英國革命本身也往往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1640年分期法的一個強有力的論據是，“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正是英國革命開闢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紀元。這樣說當然也有些道理，但在這個問題上不應忽視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區別。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斯大林說過：“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較為現成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已經具備時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在公開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並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卻是在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沒有具備或幾乎沒有具備時開始發生的”（〈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頁）。人類歷史只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才出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從而開始了社會主義產生、發展並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代。前面提到，資本主義時代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不能說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才開創資本主義的紀元。有些著作為了迴避這個問題，一面提世界近代史是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走向衰亡的歷史，一面卻把世界近代史第一時期（1640-1871年）說成為資本主義確立和勝利的時期，這顯然是自相矛盾，因為產生和確立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

實際上也不見得每個大的歷史時期都必須以革命作為開端，而應該對具體歷史情況作具體的分析。俄國近代史不自1905年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始，中國近代史則起於1840年。即就革命而言，1640年英國革命既非第一次勝利的資產階級革命，也說不上是第一次重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那麼為甚麼一定要把它看作是近代史的開端呢？對此的通常解釋是，德國的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遭到失敗，尼德蘭革命雖然成功，卻具有不徹底性和地方性，而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則同被馬克思稱為“歐洲範圍的革命”，“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制度”（〈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21頁）。自然，我們並不主張單純以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或尼德蘭革命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也絕不縮小英國革命作為一次重大資產階級革命的意義。但是對英國革命作過高的估價，如認為它宣告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來

臨、開闢了資本主義確立和勝利的時代等，也是不恰當的。由於歷史條件，英國革命固然比尼德蘭革命前進了一大步，但比起後來的法國革命，它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對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多次提及。英國革命以後，資本主義也還談不到確立，只是過了一世紀，歐洲才發生了規模更大、影響更深更廣的法國革命。若以徹底性衡量，或從資本主義確立和勝利的角度來看，則1789年的法國革命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更為合適。

況且，馬克思在〈資產階級和反革命〉一文中將英、法兩國革命並列在一起予以肯定，主要是為了說明隨着時代的發展資產階級已逐漸失去革命性，揭露十九世紀中期那個“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牙齒，衰頹不堪”的德國資產階級的醜惡形象，批判資產階級在1848年革命中的萎靡、怯懦和背叛。這裏絲毫也沒有貶低英國革命以前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意思。正是在此文中，馬克思歷史地指出：“1789年的革命只有1648年的革命來做它的原型（至少就歐洲來說），而1648年的革命則只有尼德蘭人反對西班牙的起義來做它的原型。這兩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比自己的原型前進了一個世紀；不僅在時間上是如此，而且在內容上也是如此。”（同上，第320頁）在其他一些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也經常把英國革命和尼德蘭革命當作同一鏈條的不同環節聯在一起予以比較，認為英國建立的是“荷蘭式的共和國”（評基佐《英國革命為甚麼會成功、英國革命史討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0頁），荷蘭、英國都是“體現着這個時期世界市場新方向的國家”（致卡·考茨基，同上第39卷第462頁）。恩格斯還特別強調宗教改革和德國農民戰爭具有歐洲意義：“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這是包括農民戰爭這一危急事件在內的第一號資產階級革命。……第一號革命——它是比英國革命更為歐洲式的革命，它成為歐洲式的革命比法國革命快得多，——在瑞士、荷蘭、蘇格蘭、英格蘭以及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瑞典（早在古斯塔夫·瓦薩時期）和丹麥（在這裏只是在1660年通過正統專制形式）都獲得了勝利”（《關

於〈農民戰爭〉，同上第21卷第459頁），並指出“從我們的觀點說明宗教改革運動是一個何等的**資產階級運動**，也確實是必要的”（〈致卡·考茨基〉，同上第38卷第260頁）。

還有人提出了英國革命是產業革命前提的理由。以此為據確定1640年為界同樣不妥。因為資本主義經歷了三個階段：工場手工業、工業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相當於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衰亡。工場手工業是現代大工業的出發點，絕不能因發展水平較低就忽略了資本主義的童年時期，正像恩格斯指出的：“資本主義制度**誕生於**——？1780左右—1800年？這個制度**誕生於**十五世紀，大工業的興起只是開創了它的全盛時代。”（〈致保·拉法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94頁）至於另一種說法，將英國革命視為把歐洲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的總過程的開端，那就更加失當。這實際上是掩蓋地理大發現後近一百五十年間歐洲資產階級對亞、非、拉丁美洲的野蠻掠奪，同時又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資本主義殖民侵略的早期鬥爭一筆抹煞。

列寧說過，“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來衡量的。早一二十年或遲一二十年，這用世界歷史的尺度來衡量，是算不得甚麼的。這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無法大略加以計算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第212頁）。劃分時代固然允許有個別枝節成分的相互交錯，但必須符合邏輯和歷史。以1640年作為世界近代史開端卻不合邏輯也不符歷史，因而不能如此慷慨地一下子把世界近代史削掉一百四十年。

#### （四）

倘若我們把十六世紀資本主義時代肇始同世界近代史發端結合起來，那就不僅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實際，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且可免除1640年分期法的種種弊端。這樣做，世界近代

史就真正稱得上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走向衰亡的歷史，工場手工業這個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完整性不受割裂，整個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從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政治革命到對外掠奪等方面都渾然一體，相互連貫。這些理由上文已多方論及，茲不贅述。

應該着重指出的是，這種分期法既符合西歐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歷史，也使世界近代史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範圍的歷史。在近代以前，由於封建制度及自然經濟等特點所決定，世界各地特別是大洲之間雖不無交往，但基本上各自為政，獨立發展。儘管如此，考慮世界範圍內各個大時代的劃界也絕不應以某個地區為“中心”。如中古史是封建時代的歷史，以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作為中古開端，對西歐來說可能比較合適。但以全球而論，我們中國卻比歐洲早一千年左右就進入封建社會。至若近代，隨着資本主義的出世，世界的事情就不可分割、聯成一氣了。毛主席指出：“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着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着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載1963年8月9日《人民日報》）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所作關於亞洲會議的報告中也指出：“甚麼是殖民主義，這是深受殖民主義災害的亞非人民極為熟悉的事情。再也沒有比西方殖民國家幾百年來在亞非兩洲的殖民統治更能清楚地說明殖民主義的實質。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亞非會議文件選輯》，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74頁）地理大發現後，亞、非、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紛紛遭到西方殖民者的瘋狂侵略和野蠻奴役，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正是奠基於他們的血汗之上的。“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裏轉化為資本”（《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2頁）。

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歐洲殖民者入侵之後，亞、非、拉丁美洲國家便逐漸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中。有些國家原有

的封建經濟開始解體，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有些國家雖然維持着奴隸制或農奴制，但這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奴隸制或農奴制了，它們同世界資本主義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受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制約。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第二種殖民地（種植園）中，一開始就是為了做買賣，為了世界市場而生產，這裏存在着資本主義生產，雖然這只是形式上的，因為黑人奴隸制排除了自由僱傭勞動，即排除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本身。但是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把自己的經濟建立在黑人奴隸勞動上的資本家。他們採用的生產方式不是從奴隸制產生的。而是接種在奴隸制上面的。”（《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Ⅱ第339-340頁）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裏指出：“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95頁）這是中國近代史的主要內容，也是整個亞、非、拉丁美洲近代史的基本線索。“近代以來，亞非兩洲的大多數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義的掠奪和壓迫，以致被迫處於貧困和落後的停滯狀態。我們的呼聲受到抑制，我們的願望受到摧殘，我們的命運被旁人擺佈，因此我們不得不起而反對殖民主義。”（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上的發言，《亞非會議文件選輯》第27頁）打從歐洲殖民者踏上亞、非、拉丁美洲各國的土地那一天起，各國人民就進行了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殊死抵抗。他們艱苦卓絕的鬥爭史，早已赫赫彪炳於人類歷史的篇章裏。

對於擁有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非、拉丁美洲廣袤地區來說，一部近代史就是被壓迫民族人民反對資本主義殖民侵略的鬥爭史。這一鬥爭起自十五、十六世紀之交，貫穿於整個近代史的始終，並構成世界近代史的一個主要內容。如果不從十六世紀開始來書寫世界近代史，西歐資產階級靠掠奪殖民地而起家的血和火的編年史在近代史籍上就變成殘缺不全，亞、非、拉丁美洲人民早期的反殖鬥爭

史則被劈成兩半分割在中古、近代兩個時期的史書之中，他們在地理大發現後近一個半世紀的無邊苦難和英勇反抗也將易被忽略。

人們可能會問，即使世界近代史應該從十五、十六世紀之交寫起，可是為何不以某一重大的具體歷史事件來劃界，而單挑1500年作為中古、近代的分期路標，這樣豈非把一般歷史等同於社會發展史？當然，在劃界時應該如同列寧說的，盡可能挑出那些既符合社會經濟發展又特別突出、引人注目的歷史事件作為大的里程碑。然而社會的發展並不依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特別是考慮整個世界範圍的界碑，有時不見得能覓得那麼合適的具體歷史事件。十五、十六世紀之交，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生是確定不移的事情，但歷史進程呈現錯綜複雜、曲折多變的局面，很難用某一個事件來作為整個歷史的分界線，誠如馬克思所說：“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頁）。類似的情況在資本主義完成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時也出現過。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他以馬克思主義的嚴格科學態度來具體地看待歷史，提出了一系列事件作為界標：“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到1898-1914年間先在歐美然後在亞洲最終形成了。美西戰爭（1898年），英布戰爭（1899-1902年），日俄戰爭（1904-1905）以及歐洲1900年的經濟危機，這就是世界歷史新時代的主要歷史標誌。”（〈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選集》第2卷第884頁）

或許還有的同志擔心：很多歐洲資產階級史學家是以1492年地理大發現作為近代史開端的，提倡1500年劃界是否向他們靠攏了？這種擔心也是不必要的。一方面，本文雖多次提及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的一些歷史事件，如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德國農民戰爭、尼德蘭革命等，卻並不主張以個別的事件作為中古、近代之交的里程碑。另一方面，這裏提出的界標在時間上確與歐洲某些歷史學家的主張相

當接近，但是對待同一歷史事件的看法往往有截然相反的出發點。這涉及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問題。本文力圖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形態、關於時代的有關論述來分析歷史，並因而提出1500年，這在前頭已經詳述。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界以哥倫布“發現”美洲的1492年為界標，卻往往從所謂“歐洲文明”的觀點來考慮，別有用心地鼓吹“白色人種”的貢獻，把殖民地人民誣衊為“白種人的負擔”，無論他們主張以何時何事為界標，對其謬論都須加以批判。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如以1500年為近代史的開端，近代史內部又怎樣劃分歷史時期。根據列寧的有關論述，把1500年-1789年作為世界近代史第一時期比較適宜。後面的第二、第三時期是：1789-1871年；1871-1917年。1789年法國革命不但是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最徹底的一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均有定評，而且它的時間和產業革命大體相近，對此恩格斯亦有出色的論述：“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的但是威力並不因此減弱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飆時期。”（《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1頁）這樣，近代史的三個時期就基本上同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走向衰亡的過程相吻合了。限於篇幅，本文對此不再詳加論列。

總之，這裏就世界近代史開端的問題斗膽提出一點淺見。儘管文中大量引用馬列著作，但由於自己思想政治水平很低，未能準確、完整地領會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謬誤之處在所不免，敬請同志們批評指教，匡其不逮。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

（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1期）